

西南聯大在台灣

邱華君*

摘要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是抗戰時期由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在雲南昆明，共同組成的大學，前身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由當時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共同管理，共同主導校務。為時 8 年（自 1938 年 4 月 2 日於昆明更名西南聯大，5 月 4 日正式開課，至 1946 年 5 月 4 日止，宣布結束）的西南聯大，在極端艱苦的學習環境條件下，教授埋頭研究著述、勤快傳道解惑，學生勤學永遠則有填不滿的求知慾望；師生間彼此激盪起知識火花熱鬧奔放，培養出了眾多國內外知名學者和優秀科技人文專業人才，寫下高等教育成果輝煌的史頁。

關鍵詞：西南聯大、未央歌、共議制、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壹、前言

西南聯大的全稱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係抗戰期間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與私立南開大學三校合組而成。民國 26 年(1937)，抗日戰爭爆發，三校一起南遷，先在湖南長沙合辦臨時大學。次年四月，繼遷雲南昆明，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其行政由三校原負責人蔣夢麟、梅貽琦與張伯苓三位校長組成校務委員會，輪流擔任主任委員，對外代表學校；其後蔣夢麟先生、張伯苓先後至重慶出任政府要職，故後期校務的實際負責人為梅貽琦校長。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一，弦歌不輟。教授學術研究實力，學生學習心超強，這當然是最為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還牽涉到一些特別的趣事，比如「故事」的傳播與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團」為例，校歌裡提到的「萬里長征」，由北京、天津而暫住長沙，是一段難忘艱苦遷移；第二年整團轉赴蒙自、昆明，三路人馬中，湘黔滇旅行團獨領風騷。約三百名師生組成的學習旅行團，3500 里長途跋涉，歷時 68 日，此情此景無論當時還是日後，都一再被提及，且為西南聯大堅忍精神的追求象徵。特別是西南聯大堅毅樸實精神：政治愛國情懷、社會責任承擔、學術理想抱負、遠大心胸志向，刻骨深入人心。

*邱華君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法學碩士，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副理事長，考試院顧問，淡江、世新大學兼任教授。電子郵件：james410925@gmail.com

進言之，西南聯大的成就與光輝，已經逾越了疆域的界限，成為奉獻給世界豐厚遺產，在困苦的生活環境下，保持最尊貴的思想和精神；在戰爭和革命的年代，展現出通才教育的優質適應力。「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西南聯大幾與抗戰相始終，風雲際會，求學憂國心，未央歌的情懷，百世難遇，千載難逢。聯大教授能用開闊的視野和敏銳的思維來思考各學科的發展，同時也能影響到學生思維，使學生雖在偏居一隅的地方卻能得到一流的教育成果，學驗一流的教授，優良的校風傳統，再加上抗戰時期共赴國難毅力決心、團結同心、同仇敵愾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精神，西南聯大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神話，彪炳史冊的春風化雨功績令後世敬仰。教授們雖來自不同的學校，有各自不同的學術風格和學術流派，卻有著共同的信念師道尊嚴和價值判斷，愛國愛生，高度忠誠教育。而教育理念感恩尊重教師的主體精神，締造了自由民主和諧治學勤奮教學認真的環境。

貳、西南聯大組成

按照《大學組織法》（1938年國民政府頒行）規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有校務會議和教授會。其組織大綱於1938年10月26日第92次常委會上修正通過。校務會議的成員由常務委員、常委會秘書主任、教務長、總務長（1939年7月後，增加訓導長）、各學院院長及教授、副教授互選之代表11人組成。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常務委員會委員和常委會秘書主任為當然成員。各學院設有院務委員會，由該學院各系教授會主席及教授代表組成。各系系務由各系教授會主席主持。1939年6月，常委會決議，各系教授會主席一律改稱系主任，關於各系設備、課程設計支配，均由系主任負責，系主任由常委會聘任。西南聯大期間，清華單獨設立昆明辦事處、研究院、特種研究所。研究院自1939年起逐漸恢復，設有校院組織校部常務委員會：梅貽琦（主席），蔣夢麟，張伯苓共同管理，梅貽琦擔任常務委員會主席，主導校務規劃發展。由於西南聯大為三校聯合組成，因此在組織管理上亦採取共議制，並無單一決策者，而三校皆有的系所，也因應教學需要合併，由三校原本的老師共同授課，形成當時西南聯大百家爭鳴的特殊狀況。而西南聯大下設理、工、文、法商、師範共5個學院26個學系，全校教師約有350人，在校學生約有3,000餘人，在當時的大學規模中可謂相當龐大。在西南聯大時期，三校雖然同樣隸屬於西南聯大，但三校各自在聯大內仍然設有辦事處，也各自舉行招生工作。期間教師除了由聯大發給聘書外，三校也會各自頒發聘書。

文學理學法商工學師範五個學院21學系。文科、理科、法科3個研究所共12個大學部，招收研究生。特種研究所依靠庚款基金利息，擁有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國情普查五個研究所，服務軍事研究，研製軍用飛機、軍事通信，研製出中國第一個電子管。抗戰勝利後，各研究所併入相關各系。西南聯大教學與校風有別於當時教育部對於大學「專才教育」的期許，西南聯大的教育方針則是堅持「通才教育」，無論文、理院系都有共同必修科目，確保學生的學習不

偏於一端。這種精神並非西南聯大的創舉，其實更是時掌聯大教務的清華校長梅貽琦的一貫主張。三校原先各自擁有的傳統，「清華智慧如海，北大寬容如海，南開堅定如川」。在共生共融一處的環境下，也能相生相資，造就聯大特殊的校風。首先是北大對於政治、言論、學術的自由風氣，不僅被聯大所承襲，同時亦被清華要求嚴格、重視素質的觀念影響，使得聯大風氣活潑又不失嚴謹。此外，三校教授在聯大中時常共同授課，除了研究領域接近之外，三校師長在「學統」上的接近也是主要原因。舉例來說，當時在清華任文學院長的馮友蘭(1895-1990)、中文系主任朱自清(1898-1948)，兩人皆為北大畢業。北大文學院長胡適(1891~1962)，則是遊美學務處的第二批留美生，同時更是南開的校董。梅校長則是南開學堂最早的畢業生。種種連繫交流，使得三校共聚一處學習，不但沒有相互排斥牴觸，反而能夠彼此提升共鳴，造就西南聯大這段學程佳話流傳後世(國立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2017-03-16)。在多位師長共同授一課程的狀況下，也使得聯大的教學內容與眾不同。例如文法學院在一年級共同必修的「中國通史」課程，先後由錢穆、雷海宗(1902-1962)、吳晗(1909-1969)共同授課；「統計學」則由偏重理論的楊西孟(1900-?)和重視實用的戴世光(1908-1999)二人共同授課，使課程面向多元均衡，易於因材施教，聯大學生也得以一次親炙原本分散各校的優秀學人，收穫自然更加充實豐富。清華在聯大中的另一特殊貢獻，在於嚴謹的治學態度。延續清華對學生的高標準要求，除了文學院格外看重作文、外語等基礎科目的訓練外，聯大的理工科學系尤以嚴格著稱，例如1941年機電系約有70-80名新生入學，最後畢業時僅17人而已，可見進易出難，其治學之嚴謹。此外，北大傳統對於體育教學較不重視，但清華與南開則要求非常高，聯大亦承襲了此一特色，將體育納入畢業的必修學分當中。於戰亂之中，西南聯大能夠偏安一隅、弦歌不輟，得力於三校的通力合作與團結一心精神。聯大篳路藍縷的精神與所創造的豐富學術成果，清華的梅校長貢獻付出亦功不可沒。(張德銳，2021)對於國家的前途發展，立下難以抹滅之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本部舊址，見圖1。西南聯大三位校長照片，見圖2。

圖 1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本部舊址



圖 2

西南聯大三位校長



叁，西南聯大在台灣貢獻

1937 年，因抗日戰爭爆發，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合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中央國民政府任命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三校長為臨大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共理三校校務。1938 年遷往昆明，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直至 1946 年西南聯大結束，三校分別復員，特在昆明立碑以紀念三校在抗戰八年中的艱苦合作。旋因世局變化所致，隨著國民政府遷台西南聯大影響甚大，在大陸雲南，曾經有這所西南聯大特殊的學校，畢業的 3882 名學生裡面，出了 2 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 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 位一星功勛獎獲得者、172 位兩院院士以及 100 多位人文大師等，聲譽卓著成就。茲僅遷台後就三位英明校長、三位卓越教授、二位傑出畢業生得諾貝爾獎學者的在台灣貢獻敘述如后：

一、三位英明校長

1. 梅貽琦

梅貽琦 (1889-1962) 清光緒 15 年 (1889) 生於天津，民國前 8 年 (1903) 15 歲進入張伯苓先生所辦的南開學堂，19 歲讀了四年學堂，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保送保定高等學堂。那時候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中美協議把這筆款子用來資送中國學生留美。梅校長在保定念了一年，在庚子賠款第一批考選 47 名留學生中，梅校長就是其中 1 人。宣統元年 (1909) 出國，進美國伍斯特工科大学 (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縮寫 WPI 舊譯：吳士脫大學) 攻讀電機工程，民國 3 年 (1914) 回國，在天津青年會服務一年，第二年起到清華大學任教，民國 20 年 (1931) 接任校長近半個世紀，兩岸分治後，梅校長籌劃清華在台建校，並擔任首任校長，梅貽琦校長常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以兼容並包之態度，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梅貽琦校長身教重於言教，是行勝於言的最佳典範 (張德銳，2021)。

1955 年回到台灣，梅校長全力投入清華復校。1958 年接任教育部長，但在掌理部務之餘，仍盡力貫注於清華。直到住進台大醫院，即使在昏迷中，還是惦記著部務，1961 年 3 月交卸教育部長職務以後，仍然牽掛著清華大學的事。梅校長能夠眼看到自己苦心策劃的原子爐落成啟用，實在有說不出奇喜悅與安慰。這也是梅校長對我國科學發展的最後一項巨大貢獻，梅校長與清華大學 50 年的成就，在科學方面是完全做到了。當年西南聯大時代的簡陋設備，尚能培植出楊振甯和李政道諾貝爾獎。以今日新竹原子爐的設備，第一流的原子科學家，自必能不斷的產生於台灣。貽琦校長生辦清華極為重視儉樸好學的校風，他同時提醒人才造就固然重要，人才運用也要注意，不可讓傑出人才用非所學，甚或學而不用。他強調，凡是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可指導學生如何做人，是經師亦是人師，蘊育一代學子的風骨與節操。貽琦先生的畢生理念是教育，他實現此理想的對象就是清華，他在教育上身教重於言教；他有著傳統儒家最好的性格，雖言必有中，卻寡言慎行，有人說他是「平凡裡見偉大，沈默中寓神奇」。1960 年代期間擔任教育部長、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62 年 2 月當選第 4 屆中研院院士，一生樸素對台灣教育科技貢獻居功厥偉〔註 1〕。梅校長的畢生理念是教育，他實現此理想的對象就是清華，他在教育上身教重於言教；他有著傳統儒家最好的性格，雖言必有中，卻寡言慎行，有人說他是「平凡裡見偉大，沈默中寓神奇」。以自治自理、學術自由、風骨包容、公平及多元為核心理念，帶領清華大學迎向時代的挑戰，打造生存力新思維，為國家社會培育適應未來科技人文專業人才（維基百科，梅貽琦）。

2. 蔣夢麟

蔣夢麟（1886-1964）在清末民初動盪不安的情勢之下，西化的風氣如同滔滔大浪，向中國襲來，青年蔣夢麟乘著這股浪潮，吸收來自西學的養分，之後在蔡元培的邀請下，擔任了北京大學的代理校長，開啟他與北大既深且久的淵源，也決定了他大半人生和民國教育的不解之緣。《西潮》與《新潮》裡，不僅展現了西方文明如何衝擊現代中國，也寫出了民國的文化傳承；從他發表的多篇關於教育改革的文章中，看見他對於育才的理念及熱情；在晚年持續關注中西文化比較問題，展現了他對於不同文化的包容態度。透過主編楊照（本名李

〔註 1〕梅貽琦先生，字月涵，天津人，1889 年 12 月 29 日生，1909 年考取「遊美學務處」第一批留美學生，入美國吳士脫工業大學，攻讀電機工程，1914 年獲學士學位。梅貽琦校長為庚子賠款獎學金的第一批清華赴美留學生，1915 年學成後返回清華任教，1931 年出任校長。對日抗戰期間，梅校長帶領清華師生一路南遷至雲南昆明，與北大、南開合組西南聯大，因其無私風範更被推舉主持校務。他致力禮聘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任教清華，這些大師們也造就了繼起的無數人才，包括諾貝爾獎得主，為清華奠下堅實學術根基。直到 1962 年辭世，一生盡瘁清華，貢獻殊偉。（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逝世 60 周年 師生祭梅緬懷一代斯文）（2022.05.19）

明駿 1963-) 的選文，從蔣夢麟的身上，窺見一代教育家的教育理念，以及其所擁有的社會關懷 (維基百科，蔣夢麟)。

就歷史觀點而言，蔣夢麟雖少年得志，當過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長，但對國家的貢獻卻是到台灣後，主持農村復興委員會，帶動台灣農村復興，奠基民國 60 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發達，此貢獻已為史學界所肯定 (周茂春，2021，頁 4)。

蔣夢麟博士(1886-1964)，於 1909 年以南洋公學校成績單申請美國加州大學農學院就讀，認為：中國既以農立國，唯有改進農業，方可使最大多數的人民獲得幸福溫飽。他出身農村，對植物學、動物學有極大興趣，讀起來當然如魚得水，可惜，聽從朋友建議，改念社會學科，認為社會科學才重要，因而轉系改念社會學系，1912 年，加州大學畢業，並獲贈榮譽獎狀。後即啟程到紐約市，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門研究教育學。1917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學位，旋胸懷大志返國，積極投入教育及社會啟蒙等救國大業。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工作。並發表有關 教育改革與社會啟蒙文章，提出培養「科學的精神」、「社會的自覺」。在教育雜誌上發表「世界大戰後吾國教育之重點」，就教育行政與學校設施，分別提出具體意見。此文為北大校長蔡元培所重視，應聘為北大教育學教授。接著在蔡元培 (1868-1940) 辭職後代理校長，並於 1930 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是中國教育史上最年輕的大學校長〔註 2〕 (周茂春，2021，頁 5)。1949 年(民國 38 年)大陸局勢逆轉，許多有識之士留在大陸，但蔣夢麟卻選擇跟隨國民政府轉進台灣。當時台灣正處風雨飄搖迷霧

〔註 2〕 蔣校長夢麟，生於清光緒 11 年 (1886) 浙江省 餘姚縣蔣村。1897 年，蔣夢麟十二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接觸西方文化，與時任中西 學堂監督 (校長) 的蔡元培 (1868-1940)，有了師生之誼，一生甚受蔡氏之器重與提攜。1909 年，蔣夢麟以自費留學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選擇進入農學院就讀，1912 年的 6 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獲文學士學位，並獲得名譽獎。畢業後 隨即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進行修業，五年後順利以畢業論文《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s of Education) 取得該校哲學博士學位，蔣夢麟學貫中西，心懷教育興國，倡導新教育思潮，並在民國初年政治動盪的時局中接任北京大學校長，任期內展現無比的魄力和擔當，整頓校務，使得北京大學的教學和研究有穩步的上升。1938 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遷入昆明，從「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正式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蔣夢麟以北京大學校長職位任西南聯大三位常務委員之一蔣夢麟校長 (1886-1964)，為我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農業改革家。來臺後，長期擔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於推展農村建設，農業教育之推廣，貢獻良多。蔣夢麟校長所主張的平民主義或者個人主義的教育，其教育理想係在於「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之社會」。換言之，以改變社會，促進社會發展，才是 蔣夢麟校長的終極理想。

中，國民所得低迷。復興台灣的農業生產，活絡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當屬迫切需要之事，這個重擔，就落在蔣夢麟身上。土地改革是項極複雜的問題，依據美國援外計畫，在遠東地區，被列為最重要的問題。

因此在日本、韓國、台灣、越南等地區，積極輔助政府及機關團體推動土地改革運動。而一國政治趨向於民主自由或極權專制政治，可由土地改革的方法明顯看出。蔣夢麟博士認為極權國家所進行的土地改革，採用手段十分粗暴，採取暴力方式清算地主及富農，最終目的則在完成土地國有與集體農場制度，對農民並無益處。但民主漸進方式的土地改革，係根據公訂原則，逐步推動實施，採取合乎人道的溫和手段。改革目的在實現家庭式的農場，此即初魯門總統所稱：「吾人信任家庭農場為吾國 農業之基礎，並強烈影響吾人之政治體制」。台灣土地改革運動以溫和手段進行，符合美國經濟援外宗旨，致農委會主事的五位委員(中華民國 3 位，美國 2 位)，能同心協力協助台灣的土地改革運動(張德銳 2021, 頁 72-80)。擔任主委的蔣夢麟博士更是功不可沒。1952 年聘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的人口專家巴克 (George W.Barclay) 博士來台擔任農復會顧問，專門研究台灣人口問題。蔣夢麟博士 對當時台灣人口問題有了深刻認識後，遂決心推行節育運動。當時口號為：「兩個剛剛好，一個不嫌少」，不採取強制措施，而以溫和宣導教育方式，勸導國人節育，早年資助設立的婦嬰衛生所也擴大組織為台灣省婦嬰衛生中心，與聯合國衛生組織配合，在全省積極指導婦女節育工作，台灣的人口出生率就逐漸趨於緩和(周茂春, 2021)，完成階段性任務。然以當前少子化，人口出生率極低，年輕人因薪水收入不高，經濟負擔重，養不起子女，形成不婚不生不養的觀念，相對影響國家未來勞動生產力，而節育工作計畫，似已不符時空背景需求，亟需找到年輕人接受的雙贏有效對策(維基百科，蔣夢麟)。

3.張伯苓

行憲後考試院首屆院長張伯苓(1876年~1951年)，名壽春，字伯苓，中國近代教育家，南開大學、南開中學等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及校長，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創始人之一〔註3〕。

〔註3〕張伯苓當年在北洋水師學堂學習的是輪船駕駛專業，畢業以後就去了北洋艦隊。張伯苓校長在他的一生中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有功於人民的。張伯苓是我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一位著名愛國教育家，是南開系列學校的創辦人之一，先後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等學校，十年育樹，百年育人，好的教育讓中國下一代的思想、體魄都在增強。被譽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1948年6月，蔣先生幾次邀約請張伯苓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甚至寫來了親筆信。他雖本無意從政，一心只熱忱於教育，但實是盛情難卻，最後只好勉強答應。他答應的同時還提出兩個條件：一是政府任期僅為三個月，二是希望仍兼任南開校長。南開精神集中體現在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一校訓雖是在嚴修逝世後提出的，但與他的教育思想一脈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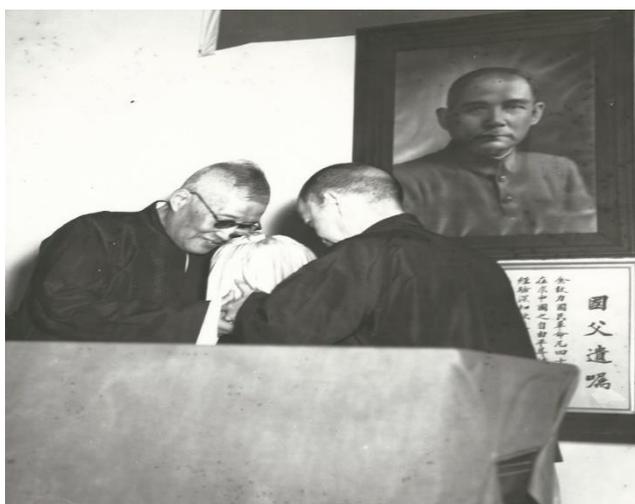
民國 37 (1948) 年 7 月 10 日，張伯苓接任院長，但他任職半年不到，就離開南京到重慶，住在沙坪壩南開中學老寓所裡。38 (1949 年 11 月 25 日，代總統李宗仁 (1891-1969) 批准張伯苓辭職。政府來臺後，張伯苓並未隨同到台灣，40 (1951) 年 2 月 23 日，張伯苓因腦溢血不幸於天津去世 (維基百科，張伯苓)。

張伯苓擔任考試院院長的時間僅一年餘，若再扣掉因病休養的時間，實際上只有半年不到，且國家當時處於內戰之中，難有實質之建樹。張伯苓院長任內，原已大致完成之文官法制，仍於行憲後陸續公布，最重要的是 38 年 1 月 1 日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為行憲後政府用人、文官管理典章制度立下重要根基。

據考試院前主任秘書許正直的記載，張伯苓的領導乃垂拱而治，他對考銓業務並不熟悉，但他慎選了兩位幕僚，為後來考銓業務的發展，帶來相當大的貢獻。一為秘書長雷法章 (1902-1988)，二為銓敘部長沈鴻烈 (1882-1969) (許正直，1980：頁 8-14)。雷法章在民國 41 年至 52 年間，更擔任銓敘部長長達 11 年 (考試院院史，2019)。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南開校友以紀念集、悼文、傳記和專著等紀念張伯苓辦學功績，每逢張伯苓逢十誕辰舉行紀念活動；大陸地區官方亦有重新評價並肯定張伯苓，海峽兩岸對張伯苓的評價趨於一致：張伯苓不僅是南開的旗幟，也是中國近代教育領域一個頗為獨特的成功者 (維基百科，張伯苓)。

圖 3

民國 37 年 7 月 10 日首任考試院長戴傳賢(右)與張伯苓(左)交接



二、西南聯大三位卓越教授

1. 胡適

胡適 (1891-1962) 是中國現代學者、思想家及新文化運動著名領袖人物，「在五四運動前後十年支配中國整個思想界」，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北京大

學教授時，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文學改革。他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開風氣之先。在哲學上倡導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的治學方法，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在政治上主張自由主義，是一位備受爭議人物。也是被各方政治勢力批評得最多的人之一¹，他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 35 個）的人之一。光緒 30 年（1904）時，胡適從安徽到上海讀中學，次年讀到嚴復所譯《天演論》，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學說的影響，當年即以「適之」為號，宣統 2 年（1910）改名胡適。1910 年獲選為清華學堂庚款留美官費生，1917 年學成返國後，歷任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教授、文學院長，並獲蔡元培之邀，先後出任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學門籌備委員、史語所特約研究員、評議員。1938 年，政府特任胡適為駐美大使，1946 年其離美返國，就北大校長職，1948 年當選中研院院士。旅美期間，胡適持續協助中研院探訪研究人才、籌措經費，並致力推動恢復院士制度。1957 年 11 月，胡適奉命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其任內竭盡所能為中研院爭取預算，新建生物館、數理館、學人住宅，改善中研院之軟硬體設備，同時，依據朱家樞（1893-1963）前院長之規劃，持續籌備近史、民族等所。正當中研院穩步走向開放與發展之際，1962 年 2 月，胡適心臟病突發而猝逝（維基百科，胡適）。

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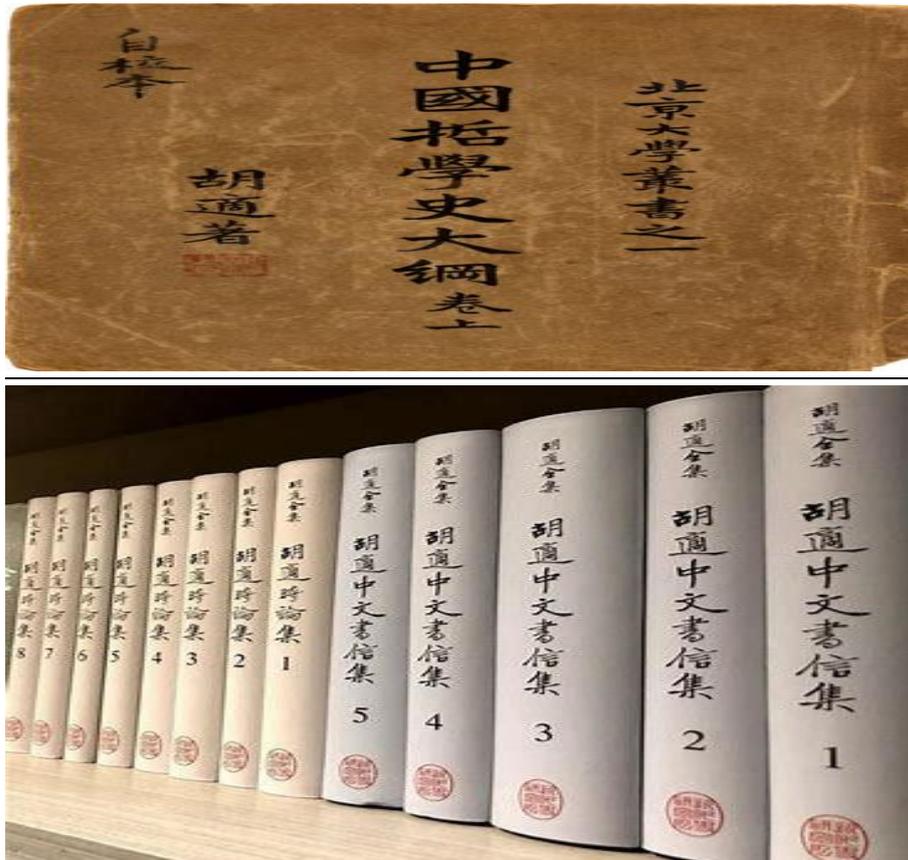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院長胡 適



綜之，胡適（1891-1962），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他領導的白話文運動改變了現在華文使用者的溝通方式。對日抗戰時，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促成中美合作抗日。雖然與執政黨關係密切，卻自始至終信仰自由與理性，堅持學術

獨立與人權，對中國／台灣留下的影響至今仍然深刻。胡適於 1958 年自美國回到台灣接任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長，對台灣的政治、教育、社會以及文化領域多有建言。並在吳大猷的協助下擬定〈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劃的綱領草案〉，促成「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創立，奠定臺灣 50 幾年來人文與科技發展的重要基礎，其貢獻不言而喻。(2018 年 12 月 17 日新書發表會-胡適全集 4)〔註 4〕

圖 4
胡適著作



〔註 4〕《胡適全集》的編輯分類為：《文存》、《書信集》、《時論集》、《日記》、《詩存》、《單行本論著》以及《文章編年》。首先出版的兩大亮點是《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及《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胡適時論集，不只可以窺見胡適觀察時局的角度，更可清楚洞悉其學養，為此把《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作為首要編輯目標。《胡適全集·政論》，但內容不限於政治評論，舉凡胡適應時而發的議論皆在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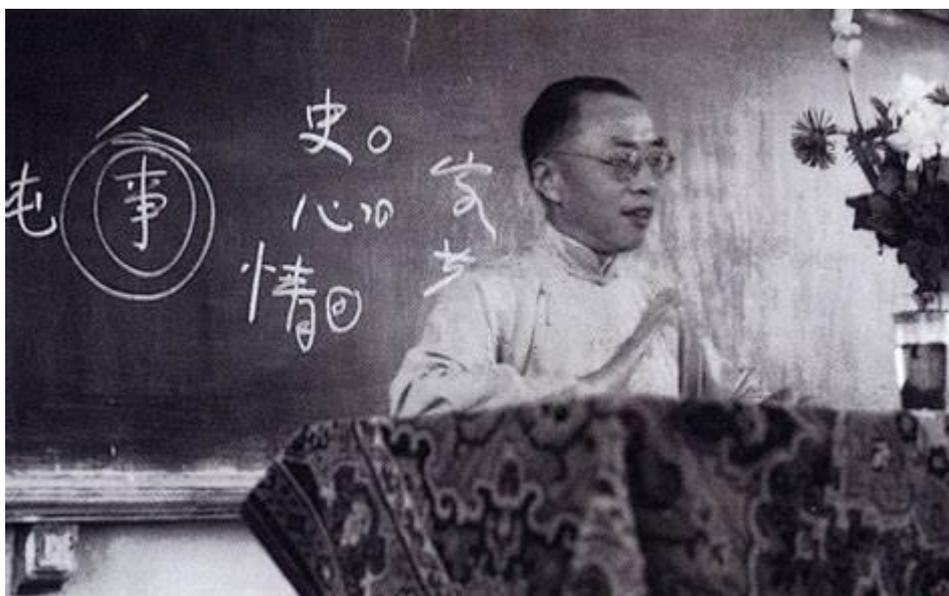
2. 錢穆

錢穆（1895—1990），字賓四，著名歷史學家，江蘇無錫人。1912 年始為鄉村小學教師，後歷中學而大學，先後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數校任教。1949 年隻身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1967 年起定居臺灣從事教書寫作。〔註 5〕

錢穆先生在抗戰前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同時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兼課，七七事變後隨三校西遷，成為西南聯大教授。錢穆先生在北大和西南聯大歷史系講授的是「中國通史」，他蜇居昆明東郊宜良山中「岩泉寺」，撰寫《國史大綱》，出版後引起爭相閱讀，為學界稱道經典著作，至今仍為研究史學者依循必讀典籍（維基百科，錢穆）。

圖 5

錢穆上課神態



〔註 5〕. 錢穆（1895 年-1990 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一生以教育為業，歷任燕京、北大、清華、西南聯大、齊魯、華西、四川、江南大學等高等學府，是香港新亞書院創辦者之一。與陳寅恪、陳垣、呂思勉並稱 20 世紀中期中國史學四大家。被學者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一生寫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論語新解》、《朱子新學案》等六十餘部著作。其著作《國史大綱》中提出：「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的觀念，在抗戰歲月乃至今日對於鼓舞民心、振作士氣，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都起到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圖 6
錢穆著作



圖 7
錢穆在西南聯大上課的學生



錢穆認為青年為國家棟樑，是未來式，而不是當前讀書時。當前應以自己努力讀書、能求上進，以專業成才，日後為國家建設有所貢獻才是學生的本分。

錢穆先生對於史學貢獻最大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思想史與學術史。在兩漢經學史方面，他在《兩漢經學今古文學平議》中指出，所謂兩漢今古文之爭不過是立官學之爭，而非清代人所演繹出來的今古文學的不同。這個意見在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深刻而有洞見的觀點，可惜並未產生足夠的影響。直到今天，一部分學者開始從頭反思經學今古文問題，才重新意識到錢穆先生這一觀點的重要性。

在學術思想方面，尤其令人推崇他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錢穆先生在演繹學理，闡述思想方面有他頗為獨到的功夫。這種眼光和功夫也同樣體現在

他的《朱子新學案》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這種學術風格，在當時的歷史學者裡面，實在是找不到第二個人的。而相比之下，當時的哲學學者中，講同樣問題時，義理之深奧幽玄或能勝之，但多不免摻雜西學影響，又或只集中在對象學說中的一點，而失於對其整體學術的講評。所以既能把歷史中的思想演變捋出一個成型的脈絡，又能用傳統中國學術的語言，同時還不代入自己的過度演繹，能把這種工作做好的，也只有錢穆先生。至於說錢穆先生影響最大的作品，當然是《國史大綱》（錢穆，1996，頁35）。

錢穆治學講究有大視野，從大處入手，由博而精。「先從大處著手，心胸識趣較可盤旋，庶使活潑不落狹小。」他從自己十年苦讀中領悟到，求速成找捷徑是做學問的大忌，治學者應該「厚積薄發」。認為「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鄺家駒 1923-2012《追憶錢賓四師往事數則》）他雖然是治史專家，卻披閱廣泛，發現學生手中有好書就借來一讀。40年代在西南聯大時，錢穆見學生李埏有一本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我的自傳》，也頗有興趣，並據此寫了《道家與安那其主義》一文，發表後引起了讀者極大興趣。他主張多讀書勤思考，觸類旁通，認為東方治學與西方不同，西方學問分門別類，互不相關，中國學問分門不別類。經史子集四部，是治學的四個門徑，入門後，觸類旁通，引伸深化，最後融而為一。認為「讀書當仔細細辨精粗」，「讀書當求識書背後之作者」。而且要抱著謙虛的態度，對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禮敬之心，這樣才能有所得。（錢穆，2009，頁352）於講授中國通史時，正值日寇大肆侵華，錢穆上課時時常結合歷史與現實申講，激勵學生的愛國之情，上課時每每座無虛席。當時剛遷至西南聯大不久，大家因時局失利情緒低落，在上歷史課時，錢穆經常聯繫中國歷史，充滿信心地說，統一和光明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暫時的，是中國歷史的逆流，勝利一定會到來，給師生很大的鼓舞和期待。

當時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同事陳夢家（1911-1966）建議他根據講義，撰寫一本《國史大綱》，振奮民族精神。書生報國惟有筆，錢穆當即接受建議，決定撰寫一部新的《國史大綱》成書於抗戰最艱苦之歲月，全書充滿了錢穆對於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思索。其弟子嚴耕望（1916-1996）撰文回憶錢穆時說，「此刻抗戰正艱，此書刊出，寓強烈之民族意識，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中心論旨，激勵民族感情，振奮軍民士氣，故群情嚮往，聲譽益隆，遍及軍事政治社會各階層，非復僅鬻宇講壇一學人。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在《國史大綱》中錢穆要求讀此書先具備「一種對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之溫情與敬意」的信念，「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錢穆認為，「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一部《國史大綱》因揭示本國以往歷史之精神所在，而鼓舞全國上

下奮起之鬥志與信心，以探求禦敵救國、復興中華之道。錢穆作為一學人，以文報國，他的拳拳愛國之心至今感染並教育著後人。（金耀基，1990，頁 5-6）錢穆於 1967 年離開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任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及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錢穆博通經史文學，擅長考據，一生勤勉，著述不倦。他畢生著書七十餘種，共約一千四百萬字，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中華文化和中國歷史的通論方面，多有創獲，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

錢穆晚年定居台灣。在台灣の士林外雙溪素書樓悉心撰寫晚年又一部巨著《朱子新學案》，期間還高票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5。《朱子新學案》寫作前後歷經七年，寫成之後，錢穆又應邀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教授，在家中授課，台灣の大專師生許多人旁聽，講課的內容集結出版為《中國史學名著》和《雙溪獨語》。後來，錢穆又應邀任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由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就在住處對面，因此錢穆每日到台北「故宮博物院」讀《四庫全書》，後寫成《孔子傳》與《理學六家詩鈔》等書。錢穆 70 歲時就已患眼疾，視力逐漸衰退，導致最終失明。即便如此，錢穆仍著述不輟³，靠其夫人誦讀，口授訂正，出版《晚學盲言》，其治學精神埋首投入無人相比可見一斑（維基百科，錢穆）。。

3. 吳大猷

吳大猷（1907.9.29-2000.3.4），著名物理學家，被譽為中國物理學之父。1933 年（民國 22 年）獲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1939 年獲中央研究院丁文江獎金，1948 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83 年 11 月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維基百科，吳大猷）。

吳大猷院長畢生獻身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為我國科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世界物理學界享有盛譽。在原子和分子的一般理論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兩項研究為後來的工作開闢了道路，一項是關於重原子 f 態的計算，另一項是閉殼層電子激發態的計算。在西南聯大任教的 8 年期間，吳大猷院長主要負責的科目為電磁學、近代物理、量子力學和古典力學等等，在這方面也培育出許多傑出的人才，李政道和楊振寧 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兩位。在原子和分子的一般理論方面付出了重大貢獻。

1948 年時，吳大猷便以第一屆院士的身份參與了中研院的發展。而在中研院遷台之後，伴隨著歷屆院長的努力，台灣的學術地位逐漸受到國際的肯定，並且培育出不少各領域中的傑出人才。1967 年 5 月，吳大猷接受錢思亮邀請，回國任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科會之任務為執行國家科學發展之政策，吳就任之後便重新擬定台灣科學發展方向，決定科學教育、設備及人才培育著手，並設置研究輔助費的辦法，並設立科學資料及科學儀器中心，專門收集各科學工業先進國家之科學工業技術資料，為學術、工業及各界服務。1969 年，有鑑於台灣地震的頻繁，他與數位留美地震學者商討籌劃地震的研究設

施，翌年開始巡視全台的地震測量站，規劃建立全國的地震測量網和資訊傳遞系統。1972年，台灣地震站網已經完工，開始從事分析測量等工作。1973年辭國科會主委，在國科會6年任期中，提出多項發展台灣科學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成為十年後科技進步的基石。1984年，核定成為了中央研究院第六任的院長。吳大猷認為，中研院的組織若沒有大學學生的新血的持續投入，就如同軍隊有將無兵，因此在任職院長期間，他積極推動中研院與大學間的學術交流，許多大學的年輕學子因此得到了中研院的師資以及研究設備的補助。（吳大猷，1986，頁7）

此外，吳大猷院長也在中研院的各研究所中增設「學術諮詢委員會」，由院方聘請了國內外的學者所組成，其任務是與所內人員檢討、建議研究方針及重要學術計畫和國內外合作的事宜〔註6〕。而吳大猷院長自接掌中研院以來，也一直力求改善中研院的環境，例如研究設備、學術風氣及建立公平公正的人事制度等（維基百科，吳大猷）。

圖8
吳大猷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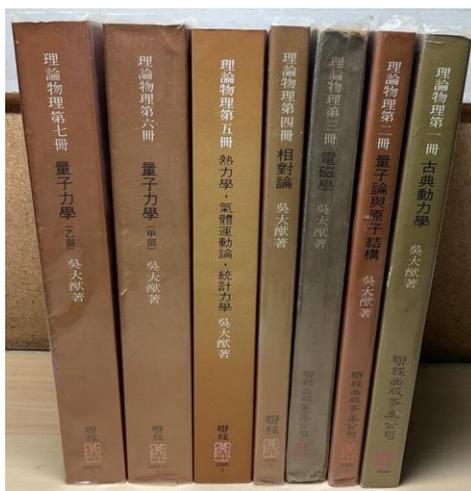


圖9
吳大猷院長



〔註6〕在西南聯大的期間，北京大學為了慶祝40週年，邀請學校的教授撰寫論文與之共襄盛舉，吳大猷便以《多元分子之振動光譜及其結構》為題，撰寫了一篇論文書籍，但沒想到，此書一流出國外立刻引起國際知名物理學家的同聲讚譽。1956年，吳大猷應胡適之邀回台，胡適懇請吳大猷擬出具體的方案。吳大猷在科導會期間，屢屢向政府提出不少具體的政策建言，有些雖然因為政治因素並未能實施，但極大部分都有相當的成果。當時美國政府對於台灣設立科導會，積極籌劃科學發展措施給予很大的肯定以及重視。

1993年，吳院長經過十年漫長的努力，心感該是世代交替功成身退的時候，於是該年的國慶日向當時的總統遞出辭呈，並獲得批准。回顧吳大猷院長在中研院所作的努力，他除了是歷屆院長中任職最長的一位外，也是對中研院付出貢獻最多的一位，他對中研院的付出心力，因此而在學界被稱為「中研院的拓荒者」的美譽（維基百科，吳大猷）。

圖 10

吳大猷、李政道、楊振寧師生



三、傑出畢業學生

1. 李政道

李政道（1926-2024），為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維基百科，李政道）。

李政道長期從事物理方面研究，在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核物理、統計力學、流體力學、天體物理等領域做出成果。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領域，他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論、弱相互作用的普適性、中間玻色子理論以及中性K介子衰變中的C P破壞等研究成果。他還曾創立非拓撲性孤子理論及強子模型，提

出量子場論中的「李模型」、「K L N定理」及「反常核態」概念等。

李政道曾就讀西南聯大，亦為國立清華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清大在 1997 年頒給他名譽理學博士學位。李政道也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的名譽講座教授，台師大美術系名譽教授蘇憲法（1948-）指出，李政道喜歡畫畫，也分享他用簽字筆插畫形式表現的物理學，時任校長郭義雄（1941-）決定聘他為美術系名譽講座教授（維基百科，李政道）。

李政道 1926 年出生名門世家，其父親李駿康是金陵大學農化系首屆畢業生，祖父李仲覃（1870 年－1941 年）為蘇州聖約翰堂的首任華人主任牧師（教區長）。李政道曾在蘇州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因抗日戰爭，中學未畢業。1943 年在貴陽以同等學歷考入遷至貴州的浙江大學物理系，步上物理學之路，1944 年，日軍進入貴州，浙江大學停學。1945 年轉學到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為二年級生，師從吳大猷及葉企孫（1898-1977）等人。吳大猷教授評價在西南聯大就讀時的李政道說：「每日來我處，要我給他更多的閱讀物和習題，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我無論給他怎麼難的書和題目，他很快就做完了，又要來索要更多的。」抗日戰爭結束後，西南聯大停辦，李政道因此沒有畢業。適值國民政府想派優季青年學生出國深造，有兩個名額是給學物理學生，李政道在導師吳大猷教授的推薦下，1946 年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師從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 1901-1954）。

1950 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與合作者一起從事統計物理的相變以及凝聚體物理學的極化子的研究（李政道，2002，頁 26）。〔註 7〕1953 年，他任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工作是在粒子物理和場論領域。1956 年，30 歲的李政道和 34 歲的楊振寧在美國《物理評論》發表文章，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parity violation），並因此於 1957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58 年，李政道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二屆院士，年僅 32 歲，至今仍為最年輕當選的院士，帶動在台灣物理學方面深廣研究，對後輩學子指導學習，貢獻良多。李政道 2024 年 8 月 4 日凌晨 2 時 33 分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去世，享年 97 歲，11 月 24 日上午，骨灰歸葬蘇州吳中太湖之畔（維基百科，李政道）。

〔註 7〕李政道教授，生於 1926 年，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物理學系（1945），後赴美取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博士（1950），為 1957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李教授專長於理論物理各領域。其研究範圍包含粒子物理、統計物理、場論、流體力學與天文物理等。1956 年與楊振寧共同發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恆質疑」一文，提出宇稱不守恆可能是普遍性的基礎科學原理。這個論點於 1957 年由吳健雄與 E. Ambler 的實驗獲得證實，李政道與楊振寧也因而得到當年諾貝爾物理獎的殊榮，曾獲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等榮譽。李教授長期關注華人物理學界的發展，致力於臺灣與中國大陸物理界研究發展與人才培育方面，於美國時間 2024 年 8 月 4 日在舊金山逝世，享耆壽九十八歲。

2.楊振寧

圖 11

楊振寧和李政道（左）在普林斯頓(1957年)



楊振寧，1922年10月1日出生於安徽省合肥縣，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楊振寧1938年3月，楊振寧到達昆明，曾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以總成績第二名考入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12月，轉至物理系，當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三所學校臨時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抗日戰爭時期學習條件艱苦，楊振寧剛到西南聯合大學時，40位同學合住在學校臨時在城西北郊搭蓋的茅草房中，飯堂沒有板凳，所有人站着吃飯，吃摻有糠皮的糙米。在西南聯合大學6年時光對楊振寧人生體驗產生影響，在國破家亡的邊緣，增強了他的憂患意識，尤在特殊非常時期，能坐下來讀書已是多麼不容易，大家都很堅強毅力。於1942年從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畢業，1944年，獲得清華大學研究院碩士學位。1948年6月，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哲學博士學位。1949年—1966年，任職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1957年10月，因「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的研究以及由此導致有關基本粒子方面的許多發現」，與李政道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再者，楊振寧在數學天賦曾嶄露頭角，其父親並沒有催促他繼續拔高數學領域成就，而是給他請家教補習《孟子》，使他學習補足中國歷史知識，學習到很多中學課本中難以學到的中華傳統文化知識。楊振寧能得到我們社會的肯定，當然源自於他和李政道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獎的兩個中國人，但是後來有人問起楊振寧，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時，他的回答卻是「改變了中國人不如人的心理」，清楚看到他對於自己文化傳統一種自信心的看重態度。（楊振寧，2020，頁236）

另有點觀念值得一提，人總喜歡強調楊振寧的物理風格，在20世紀中可以說是承愛因斯坦（1879-1955）與英國大物理學家狄拉克（1902-1984）以降，同樣展現精妙數學與玄奧物理微妙關聯的一代大師，我們看到楊振寧對於科學的

貢獻，即可知道，他承襲自中華文化傳統內涵，對於宇宙奧秘一種不可思議級未可能盡知的哲思。〔註 8〕

肆、西南聯大校風再發揚

校訓（風）是學校發展領航方向，導引師生達成的目標，也是一個學校建立的品牌，更是培養學生學術成就與人格塑造的指標。西南聯大熔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校風「剛毅堅卓」於一爐，集三校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於一堂，可謂大師雲集，群星璀璨。據統計，聯大的教師隊伍常年穩定在 350 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講師、專任講師、教員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師總數的一半以上。在 179 名教授副教授中，還有 150 多名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曾留學歐美的學者。以西南聯大和任何一所大學所培養出來的，只稱作「潛力人才」，有心者需要經過一個深造的環境對接，才能成為可用之材。《荀子·勸學》曰：「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捨，金石可鏤。」志向堅定，用心專注，珍惜時光，這三點，看似不高亢、不起眼，卻成就了他們的「大器」。一種學習態度，其實蘊含了人格品行的自我修養和深邃的中華文化精神。

《道德經》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德厚之人如嬰兒一樣純潔，無所畏懼，不會像普通人那樣計較眼前的得失。曾從師長耳聞西南聯大上百名學子，一批堪稱「傑出」人物的回顧。深入到這些名人學者的「精神成長」中，就會發現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接了東方文化的智慧與美德。他們皆具專注而獨立的品行，不從流俗，不附平庸。「從蔡元培（1868-1940）開創的北大校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艱苦條件之下堅持做學問，是西南聯大最重要的學風。西南聯大很艱苦，但是還有實驗課。你必須上。管理得很嚴。」成就出努力又有實力青年。北大 沒有明訂校訓，尊重學生各種選擇，有著各種可能性，不劃地自限。「北大，堅持著「勤奮、嚴謹、求實、創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以『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為總特徵。」（溫儒敏，2014，頁 7-14）

〔註 8〕李政道於 1950 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隨後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與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從事研究。1953 年被聘為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3 年後晉升教授，當時才 30 歲，是該校最年輕的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理論、核物理、統計力學、流體力學、天體物理等。

1956 年 10 月，李政道和大他 4 歲的楊振寧在美國 *Physical Review* 聯袂發表論文，質疑弱交互作用中的奇偶性（通常譯作宇稱）守恆問題（conservation of parity）。翌年初獲得吳健雄實驗的明確證實，引起轟動，當年就獲得了 1957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時，李、楊兩人都還保有中華民國國籍。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將「公」、「能」二字定為校訓。其中「公」意為無私無我，「能」意為實幹苦幹。校訓全文為「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允公允能」，指的是既有愛國愛群之公德，又有服務社會之能力；「日新月異」取意於《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南開大學的校風是「愛國、敬業、創新、樂群」。(南開大學，www.nankai.edu.cn)

清華大學 1914 年 11 月 5 日，學者梁啟超（1873-1929）蒞校演講「君子」，以《周易》乾坤二卦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為中心，期許清華學子成為新時代的「真君子」，清華校訓由此而來。新竹建校後，取于右任（1879-1964）先生所書校訓，題於大禮堂外牆，沿用至今成為校訓代表樣式。(國立清華大學 (wikipedia.org)，2008)

梁啟超先生演講內容精要如下：

乾象言：君子自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學者立志尤須堅忍強毅，雖遇顛沛流離，不屈不撓；若或見利而進，知難而退，非大有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子世猶舟之航海，順風逆風，因時而異。如必順風而後帆，登岸無日矣。

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君子責己甚厚，責人甚輕。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蓋惟有容人之量，處世接物，坦然無所芥蒂，望之儼然，此所以為厚也，此所以為君子也。9 清華學子，薈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俊秀，為師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遊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草，今日之清華學子，將來即為社會之表率，語、默、作、止，皆為國民所仿效，設或不慎壞習，慣之傳行，急如暴雨，則大事債矣。深願及此時機，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

西南聯大三校各有校訓或學風，型塑人格特質，薰陶學生品德，造就日後學生為人處世的典範。因此至今三校畢業校友的出路優異表現，令國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不辜負國家人民的期盼。

梁啟超先生又引申勉勵清華學生說 (維基百科，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子，薈中西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草，今日之清華學子，將來即為社會之之鴻儒，集四方俊秀，為師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遊海外，吸表率，語、默、作、止，皆為國民所仿效，設或不慎壞習，慣之傳行，急如暴雨，則大事債矣。深願及此時機，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則民國幸甚矣！

《周易》即《易經》。孔子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藝」授課，「易」即《周易》。漢代將六藝立為「五經」(樂經亡逸)，因此《周易》又名《易經》。

伍、結語

自 1938 年 5 月 4 日開課至 1946 年 7 月 31 日止結束，這所在中國教育歷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综合大學，雖然隻存在了短短 8 年，卻留下了短暫但輝煌的特異大學歷史。「剛毅堅卓」既是當時西南聯大的校訓，在學校雖物質匱乏、校舍簡陋、圖書資料不足，但堅持教學與科學研究的正常開展。不僅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創舉。更是師生 8 年日常學習和生活的真實寫照。有一流的教授，優良的傳統，教授治校自主教學，治學研究嚴謹，不苟且、不浮躁，都有高尚的志業操守和敬業樂業精神。他們教書作育英才，愛之以德，不厭不倦，自敬其業，不憂不惑，自樂其道，默默耕耘，無私奉獻。教育理念尊重教師的主體精神，締造了民主自由和諧的治學研究教學服務環境（維基百科，西南聯大）。

「西南聯合大學」是一所處於時空特殊的大學，既前無古例，亦後無來者。在那個戰火連天的時代，昆明不再是世外桃源。西南聯大師生在躲避炸彈的無情轟擊、生活的窮苦、疾病的威脅多重困難災禍下，堅守風骨，儒雅溫恭，激蕩人心。西南聯大代表了一種學術生命力的傳承，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的發揚，一種堅強韌性的靈魂顯現。西南聯大能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輝煌傳頌，是因這所大學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個月時光，卻誕生了 172 位院士，8 位「兩彈一星」元勳，2 位諾貝爾獎得主〔註 9〕，9 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培養的人才超過戰前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 30 年培養的人才的總和。西南聯大的歷史是一種美好時光，是在血與火的殘酷歲月中，呈現出來人性的光明和知識分子的光輝，對我們現在的人，應該是一種智慧力量和啟示。西南聯大的自由與獨立的精神燦爛輝煌耀眼，聯大民主自由的學風，教授從不強迫學生學什麼。教授開課都是按自編教材講授，一般不受干擾。與此同時相當多的教授主張「通才教育」，認為打好「博」的基礎才易於求專求精。課時安排上讓學生有充分自學的時間，去獨立思考，自覺鑽研，鼓勵學生勤學勤思，不讀死書，不死讀書。西南聯大除北大沒有明顯校訓外各個學校都有自己的傳統，但都有自己學校的校風，各個非常優秀的，良好的傳承校訓，非常希望均衡的人格發展（Balanced personality）講究 Sportsmanship，做事公公道道，不投機，不取巧。所要求的是（一）公平競爭（fairplay）（二）力爭上游：盡力而為（三）勝不驕，敗不餒。西南聯大為人所景仰的，在其名師高徒，更在其學術自由。在行政上，聯大推行「教授治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實現人生的真諦，為理想而奮鬥，尋出一條安身立命的原則，開創人生美好光明的前程。

〔註 9〕 1895 年，諾貝爾立囑將其遺產的大部分（約 920 萬美元）作為基金，將每年所得利息分為 5 份，設立諾貝爾獎，分為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文學獎及和平獎 5 種獎金（1969 年瑞典銀行增設經濟學獎），授予世界各國在這些領域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為了紀念諾貝爾做出的貢獻，人造元素鎳（Nobelium）以諾貝爾命名。

參考文獻

- 百度百科 (2021)。蔣夢麟。取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8B%E6%A2%A6%E9%BA%9F#31>。
- 余英時 (1983)。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
- 何炳棣 (2004)。讀史閱世六十年。商務印書館。
- 何偉全 (2014)。西南聯大研究第 2 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考試院 (2020)。考試院院史。考試院。
- 李政道 (2002)。物理的挑戰。中國經濟出版社。
- 車 銘、林毓杉、符開甲 (1988)。戰爭烽火中誕生的西南聯合大學，收錄於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貴州民族出版社。
- 何偉全 (2014)。西南聯大研究第 2 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金耀基 (1990)。懷憶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新亞生活，18(2)。
- 周本貞 (主編) (2005)。西南聯大研究第 1 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周茂春 (2021)。蔣夢麟博士的傳奇人生。土地改革紀念館電子報第三期。
- 周質平 (2002)。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南京大學出版社。
- 吳大猷 (1986)。科學與科學發展。遠流出版社。
- 吳大猷 (1998)。抗戰期中之回憶：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啟示錄（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尚 嘉 2010。論教育家校長的塑造力—以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梅貽琦為例，中國電力教育。
- 胡 適 (1981)。胡適口述自傳。遠流出版社。
- 胡 適 (1919)。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
- 胡 適 (1921)。杜威先生與中國。東大圖書。
- 孫彥民 (1971)。張伯苓先生傳。台灣中華書局。
- (2021)。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九州出版社。
- 陳憲民 (1999)。蔣夢麟教育思想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梅貽琦 (2018)。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中華書局。
- 聯合報 (1962)。國立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逝世 60 周年新聞。聯合報。5 月 20 日 2 版。
-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2010)。校史：西南聯大時期。國立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原始內容存檔於 2016-09-14）。
-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2012)。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清華大學校史紀念室。
- 張伯苓 (2018)。我們要振作起。石油工業出版社。
- 張德銳 (2021)。永遠的清華校長梅貽琦傳略—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0(6)，79-87。
- 梁吉生 (2009)。張伯苓年譜長編（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 楊 照 (2024)。解讀蔣夢麟。三民書局

- 楊振寧 (1980)。楊振寧選集 (2020 年再版)。商務印書館。
- 馮友蘭 (2018)。我與西南聯大。石油工業出版社。
- 維基百科 (2024)。胡適，<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梅貽琦，<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張伯苓，<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蔣夢麟。<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錢穆。<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吳大猷。<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李政道。<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楊振寧。<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維基百科 (2024)。國立清華大學。
- 維基百科 (2024)。西南聯大。<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錢穆 (1994)。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51 冊。聯經。
- 錢穆 (2009)。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東大圖書公司。
- 蔣夢麟 (1967)。新潮。傳記文學。
- 劉克選 (1998)。北大與清華。國家行政學院。
- 羅常培 (2020)。俞國林 [整理]。中華書局。
- 聞黎明 (2010)。抗戰風雲中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秀威資訊。
- Sutherland, B. (2012). Beautiful Model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 Yang, C. N. (1963). *Elementary Particles: A Short History of Some Discoveries in Atomic Phys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e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Taiwan

Haw-jiun Chiu*

Abstract

The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was a national public university from 1938 to 1946 based in Kunming, Yunnan, China. It was formed by the wartime incorporation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Nankai University.

Whe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1937,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 merged to form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in Changsha and later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Kunming and Mengzi,

Over those years of war (1937-1945), Lianda became famous nationwide for having and producing many of China's most prominent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the Nobel Prize laureates Yang Chen-Ning and Tsung-Dao Lee.

Keywords : National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commonly known as
'Lianda 'Ccollegiate system Endless song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James Haw-Jiun Chiu, Professor of Shih Hsin University.